

缪文远著

戰國策新校注

(上)

巴蜀書社

缪文远著

戰國策新校注（上）

巴蜀書社



缪文远著

戰國策新校注（下）

巴蜀書社

责任编辑：袁庭栋
封面设计：曹辉禄
封面题签：缪 钺
扉页题签：黄稚荃

战国策新校注（上）

缪文远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9.625 插页2 字数390千

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690册

ISBN7-80523-140-0/I·61 (精装) 定价：6.10元

责任编辑：袁庭栋
封面设计：曹辉禄
封面题签：缪 钺
扉页题签：黄稚荃

战国策新校注（下） **缪文远**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9.875 插页 字数394千
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690册
ISBN7-80523-141-9/I·62 **定价：5.95元**

戰國策西周卷第一

縉雲鮑彪師道重校

西分輩立在也以王之後至平王年河考王城即王初立也河南漢志周遷地也河南周治以考東何稱以後所是考王定周鄆武封王其弟按大穀城平陰偃師矣顯王十河南洛爲謂西周以王下九鼎於河記周公貞定師二公東年桓陽西周者豐城城下都于都於南之遷公貞定師趙號周河公爲自洛河南也東周相朝以周公貞定師與奉惠公復立南都東周者東都平王徙成是桓王二十分者惠是自立威王視周者東都焉王爲都南二十周爲東時公城王視城洛都平王徙成是桓王二十二於亦西周子子下則陽也威東都成是桓王二十西号未於公則西何烈遷成周爲公八皆是東自雖班惠都也自

元至正刻本《战国策》书影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

高誘注

秦興師臨周續周書王後語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
讀作率也當如字或切後語注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數
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續齊宣王後語曰夫秦之爲無道也
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劉增集解計
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
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
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
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
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講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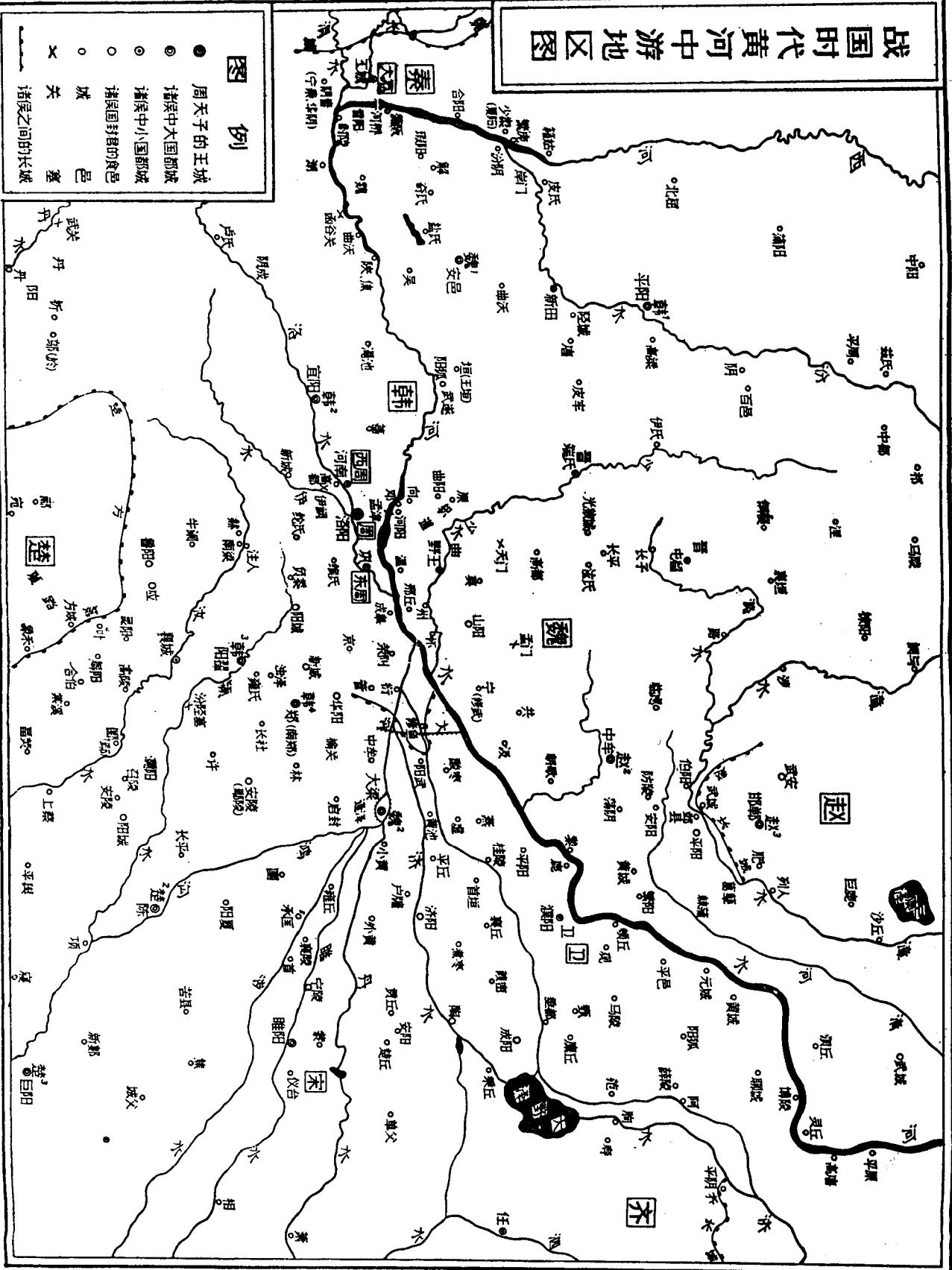
宋绍兴刻本《战国策》书影

战国时代黄河中游地区图

图

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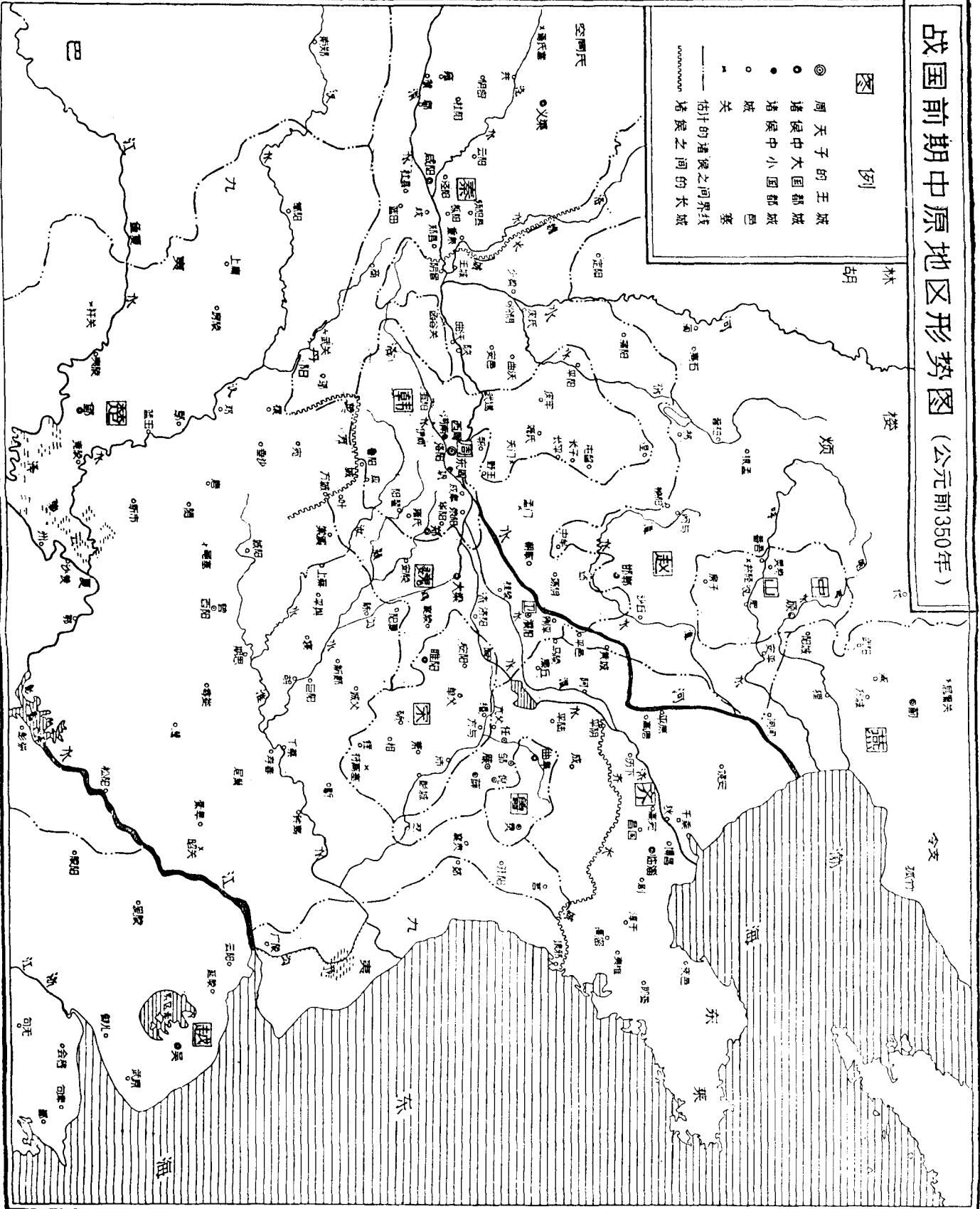
- 周天子的王城
- ◎ 楚侯中大回国都城
- 谢侯中小国都城
- 楚侯国封君的食邑
- 城邑
- X 关塞
- 诸侯之间的长城



战国前期中原地区形势图（公元前350年）

图例

- ◎ 周天子的王城
- 诸侯中大都城
- 诸侯中小国都城
- 城邑
- 关塞
- 估计的诸侯之间界线
- ~~~~~ 诸侯之间的长城



序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缪文远君，治先秦史多历年载，于《战国策》致力尤深。勤蒐博采，研精覃思，既已撰著《战国策考辨》、《七国考订补》，由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刊行问世矣；近又董理积年旧稿，对《战国策》全书校勘疏释，成《战国策新校注》，将付巴蜀书社印行。缪君持书稿相示，余读而善之，因书其端曰：

自东汉高诱注《战国策》，其后宋姚宏、鲍彪、元吴师道，均有校注。清人治《战国策》撰著成书者亦不下数家，其中固多精言正解，然亦不免疏误缺失，此固由于研虑不周，而凭藉不足，参证无从，亦一因也。缪君校注此书，既博览前人疏释考证之作，择善而从，又蒐采晚近出土之竹简、帛书、铜器、石刻，与文献参稽互证，细心研寻，遂能发覆纠谬，度越前修。此固由缪君用力精勤，抑亦时代之赐矣。兹就释事、释人、释地、释官、释文辞诸端举例以明之。

释事者：《齐策一·邯郸之难章》载魏攻赵邯郸，齐军救赵，败魏于桂陵事。本书取银雀山所出《孙膑兵法》以印证之，较《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记更为本末详尽。又《秦策二·医扁鹊见秦武王章》载扁鹊以石为秦武王医疾事。本书取山东出土之汉画像石“扁鹊针灸行医图”（此石今藏曲阜孔庙

内)加以证释,其事益明。

释人者:《中山策》载司马喜相中山,旧注于司马喜但言其为中山臣。本书取《吕氏春秋·应言》载墨者师与司马喜(喜与喜古通用)于中山王前议兴兵攻燕事,证以河北平山所出之中山器,知此司马喜实即《中山王鼎》铭文所言“奋桴振铎”亲率三军攻燕之中山相邦司马赒。又《战国策》多记奉阳君事,其人亦见《史记》。但此奉阳君为何人?与李兑是否一人?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本书证以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十二章,奉阳君自称其名为“兑”,“兑”即“兑”字,则奉阳君与李兑为一人明矣。

释地者:《秦策三·范雎至秦章》载秦昭王听范雎之说,“举兵而攻邢丘”。“邢丘”,《史记·六国年表》作“廉丘”,《魏世家》作“鄼丘”。云梦秦简《大事记》:秦昭王“四十一年,攻邢丘。”本书取以证《战国策》作“邢丘”为是,而梁玉绳《史记志疑》谓当依《魏世家》作“鄼丘”,乃误说也。

释官者:《齐策二·昭阳为楚伐魏章》载楚昭阳伐魏时,“官为上柱国”,而《鄂君启节》铭文则谓“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本书取《鄂君启节》铭文以证“上柱国”即是“大司马”。

释文辞者:《燕策二·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章》云:“今王(指燕昭王)信田伐与参、去疾之言,且攻齐,使齐犬马贱而不言燕”。鲍本无“贱”字,注云:“犬马,言已贱齐为之也,又不泄燕之谋。”吴师道曰:“字书无‘贱’字,恐即‘贱’。”鲍、吴之说,令人费解。金正炜《战国策补释》则谓“‘犬马’疑是‘大焉’之讹,‘大’与‘泰’通,‘泰’

焉’者，言不以燕为虑也。‘俄’或‘浅焉’二字误并为一，浅焉，犹浅然也。”金氏之说，穿凿支离，且与原文文义相反。本书取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四章以校《战国策》文，知“使齐犬马贱而不言燕”实当作“使齐大戒而不信燕”，文从字顺，积疑尽释矣。

缪君于六十年代初期草创此书，一九六六年，因故辍笔，未敢示人。至一九七六年秋，阴霾既扫，日月重光，始得重理旧业，黾勉成书，盖前后更历二十余年矣。书中于诠释文辞之外，特重年代、地理、职官、制度之考订阐释，深有裨于治先秦史者；而自订体例，去繁琐，去重复，去谬误，弃芜存精，简要爽洁，于读者尤便焉。余尝谓治学之道，贵能继承，能开创，所谓“温故而知新”者是也。然抱残守缺，暖姝自悦者，不足以语于温故；而大言空论，哗众骇世者，亦不足以语于知新。必也，沈酣故籍，而不墨守陈言，探索新知，而不妄逞私臆，立一说，树一义，实事求是，折衷至当，始可称为治学之康庄。今缪君所为，庶几近之。

余平生向慕顾亭林先生，思为宏通征实之学，以期有裨于世用。缪君从余游者三十年，耿介淡泊，不染阉然媚世之习，故独能深有契于余之所怀。今缪君研治《战国策》、先秦史，既已著述斐然，卓尔有以自见矣，然“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余更望其发扬蹈厉，温故创新，如骐骥千里之日进不已也。

缪 铖 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

一九八五年十月

自序

一九八五年秋，文远撰《战国策新校注》既成，爰自题书首曰：

战国时期为吾国古史剧变之会，世卿世禄之制废，纵横游说之风起，朝为布衣，暮为卿相者，比比然也。其显名诸侯者，若公孙衍、张仪、陈轸、苏秦辈，类能左右一时政局，为世所艳称。且不独辩士为然，诸子百家之伦，凡欲得君行道者，莫不于游说之术三致意焉。墨翟之止楚攻宋也，既使公输为之折服，又使楚王自道“请无攻宋”（见《墨子·公输》）。《庄子》书载惠施、庄周反覆辩难，汪洋恣肆，浩瀚无极。儒家之孟轲更以“好辩”著称（见《孟子·滕文公下》）。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虽口吃而善著书，精于谈说之道。韩非谓游说之难，在难于揣摩人主心理，其言曰：“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韩非子·说难》）。韩非重视游说，故广集资料，储以备用，今《韩非子》中《内、外储说》及《说林》诸篇，论其性质，实与《国策》之文为近，其中有多篇亦见收于《国策》。此类流播及传习之说辞，多为记言体，作之非一人，成之非一地，大抵皆战

国、秦、汉间游谈之士所为，其中或与史实符合，或纯为游士练习模拟之作，读者当细心抉择，分别观之，不可一概论也。

辩士之于人主也，所操者纵横权变之术，为时君出奇策异谋，转危为安，运亡为存。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张仪列传赞》）。又言蒯通“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田儋列传赞》）。而主父偃亦尝“学长短纵横之术”（《平津侯主父列传》）。西汉初叶，先有韩、彭、黥布等异姓王之封，及刘邦、吕雉诛锄功臣后，又复有刘氏诸王之封，局势有类战国，故秦及西汉初期，纵横犹为世显学，传习靡替。

战国史籍不幸而遭秦火之厄，六国及周室所藏者，尽为始皇付之一炬，竹帛烟消，坟典散亡，徒令后人兴“考古茫昧”之叹。汉兴，遗书渐出，记纵横之书既见收于中秘（刘向所见者是），亦有民间流传，佚出于中秘之外者（如马王堆帛书）。西汉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领校群书，今所传《战国策》，即刘向校录诸书之一，书名亦为刘向所加。刘向《战国策书录》曰：

臣向所校中战国策书（按：指中秘所藏记辩士游说之简策），中书余卷，错乱相揉蕡，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重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按：短长，犹言“纵横”），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远在刘向校书之前，司马迁为太史令，袖石室金匱之书，得见此类文献，即曾采录于其巨著《史记》中。宋洪迈谓：“太史公所采之事九十二则”（《容斋四笔》卷一）。据今人郑良树统计，《史记》采自《战国策》者，实有一百四十九处（见《竹简帛书论文集》）。司马迁所见之战国纵横家言，其未经刘向编订之原始面貌，今尚可于马王堆帛书得其仿佛。

秦、汉而还，历世绵邈，书缺有间，治战国史事者，舍《战国策》而莫由，此自司马迁时已然，后世更无论已。《战国策》之文，笔势纵放，英伟恢奇，才华横溢，感人至深。今载于《燕策一》之乐毅《报燕惠王书》，司马迁谓蒯通及主父偃读之，“未尝不废书而泣”（《史记·乐毅列传赞》）。唐之韩愈，宋之眉山苏氏父子无不深受《战国策》熏染。苏洵外出，每携一书自随，人或窥之，则《战国策》也。明李梦阳尝谓：“《战国策》畔经离道之书也，然而天下传焉，后世述焉”，此由“录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证其变，工文者模其辞，好谋者袭其智”（《空同先生集》卷四十九《刻战国策序》）。考史论文，《战国策》俱在所必读，以故治此书者，自汉迄今，代不乏人，惜无人汇集而理董之，余之所作，有志焉而未逮也。

《战国策》之版本，大别之，其流有二：

此书传至宋初，一度散佚，经曾巩整理校定而三十三卷复完。南宋初，荆川姚宏校注是书，忠于原作，态度矜慎，至清代经黄丕烈影写覆刻（在《士礼居丛书》内），流布极广，此本今通称姚本。

与姚宏同时，缙云鲍彪亦注是书。鲍氏改易原文，重新编次，颇为后人讥弹。元吴师道撰《战国策校注》，就鲍本订其

失误，加以补正，释疑解滞，甚便读者。《四部丛刊》初编曾将元刻本吴书影印收入，其他重刻本世亦多有。此本今通称鲍本，实包吴氏校注在内。

余意，校理《战国策》本文，举《士礼居》及《四部丛刊》二本，则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不必侈陈众本，陷于琐屑鉁钉。至于《战国策》传本源流，今人范祥雍曾写为专文，论述綦详（见《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四年第三辑），兹不复赘。

今者，党中央号召整理古籍，发扬我国数千年优秀之文化，以激励后学，振兴中华。文远深受鼓舞，故不辞谫陋，将旧日疏释《国策》之稿加以董理，以期于整理古籍之宏业有涓埃之助。于是检校群籍，丹黄杂下，春来秋去，寒暑屡更，今全稿虽告杀青，而颇有力尽神疲之感。本稿撰写过程中，经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列为重点项目，并得委员会研究基金直接资助，对国家与人民之关怀，文远衷心铭感。

文远自髫龄就傅，即喜读《国策》之文，稍长，读《史记》诸书，益震骇于苏秦、张仪辈之飞辩骋辞，而不能辨其是非，盖犹未脱童稚之见也。既冠，负笈锦城，研治古史，缪彦威师不以菲材而弃之，常为讲授古今学术流变、前贤治学之高怀远识、精思勤力，并详述自身治学之甘苦，讥弹今世学风之流弊。春风拂煦，诱掖毕至。文远虽赋性鲁钝，然亦激励奋发，深知自勉，前所撰《战国策考辨》、《七国考订补》，已蒙师审订问世矣，此稿之经营，仍得吾师指示体例，审读原稿，更复题签赐序，益觉篇简生辉。巴蜀书社袁庭栋同志，往返商榷，先后多所匡正。此稿得以公诸于世，得力于时代之赐及师友之助者为多。今虽规模粗具，而讹缺难免，惟冀博雅通人，

不吝指正，教督以所不及，则匪只文远一人之幸而已。

日本学者小南一郎教授远道惠寄小川环树教授和他本人有关《战国策》之研究论著，供我参考，盛情可感，谨申谢忱。

缪文远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于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